

一份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珍贵文献

——写在《萧友梅编年纪事稿》出版之际

□居其宏

在20世纪中国新音乐史上,萧友梅作为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的历史地位和杰出贡献无人能及。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点曾受怀疑、被贬低、遭否定;时至今日,虽仍然有极少数人将百余年来中国新音乐史描绘成一团漆黑并将种种“罪责”归咎于萧友梅,但历史老人毕竟是公正无私的——20世纪70年代末开创的新时期以来,随着有关萧友梅生平事迹、创作著述活动的文献、史料的出版和新史料的不断发现、披露以及相关研究、评论的愈益深入,音乐界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渐趋公正和客观,一些暧昧不清的问题日益明朗化,由此而引起的诸多争论也渐渐平息下来。当然,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交锋是极正常的,有比较才能做出鉴别,有争论才能明辨是非;而这种鉴别与明辨,都必须以确凿的史实、可靠的史料为依据。

由是观之,文献与史料的发掘对于学术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和极端重要性不能忽视。然而令人汗颜的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中国新音乐史研究者,往往只满足于从现有文献和史料中讨生活,却疏于或不屑于从历史尘封中发掘新史料以不断充实我们的史料积累、拓展我们的历史视野,当然也不可能为新的历史认知提供确凿史实和可靠史料的坚实支撑。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之所以长期不能有较大突破与

成就,史料建设的薄弱,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前辈学者傅斯年(1896—1950)曾说:“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的进步。而史料的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①。胡适(1891—1962)也说过:“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②。完全可以说,史学是依靠史料来立论的,史料建设是史学发展的原动力。

有鉴于此,上海音乐学院戴鹏海教授、中国音乐学院张静蔚教授和中央音乐学院俞玉姿教授以及黄旭东、汪朴等学者,多年来从事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编纂,且多又有令人惊喜的发现,论其成果之丰硕、影响之深远,令我辈及后辈学人受惠不尽,对于推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可谓居功甚伟。

眼前这本《萧友梅编年纪事稿》(下简称“纪事”),是继《萧友梅作品选》(1984)、《萧友梅音乐文集》(1990)、《萧友梅传》(1993)、《萧友梅纪念文集》(1993)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关于研究萧友梅的史料性文献。我本人有幸在本书出版之前就浏览了全部书稿,在深受教益之余,根据其中新发现的萧友梅写于抗战初期之《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撰写了《萧友梅“精神国防”说解读》^③一文。故而我深信,“纪事”的出版,可说是一件功在当代、惠及

后人的善事,必将为萧友梅研究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提供一份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珍贵文献。

“纪事”是一部编年体著作,全书包括“萧友梅家谱”、“生平纪年”和“身后记事”三个部分。编纂者在坚持以“纪事正文”为主体、使其具有“年谱”体裁之固有特征的同时,还别具匠心地加入“时政提要”、“相关链接”、“深情回忆”、“学者评说”四个板块,并用不同字体加以区别,在逐年记叙萧友梅先生生平事迹及其艺术活动的基础上,通过上述几个不同板块,或交代时代背景,或旁及同时代音乐家言行,或加入亲友、同事、学生之亲见亲闻,或摘引专家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评说,与“纪事正文”彼此印证、互为发明;五个板块,主次得当,功能完备,自成系统,构建了一个视野开阔、有机联系的历史语境,不仅为读者在阅读和研究中掌握丰富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并能通过不同视角、不同侧面的史料的普遍联系和相互比较,以更全面、更真切地再现历史,从而把萧友梅先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所作所为、杰出贡献和独特的人格魅力鲜明地凸现出来。而“萧友梅家谱”,则如实体现了萧氏家族久远的人文历史渊源;“身后记事”,又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到萧友梅生前含辛茹苦地播下的“种子”在他逝世后发芽、成长、壮大的基本轮廓以及后人对他如何的敬重、缅怀和纪念,展示了萧友梅对后世音乐教育事业的积极影响。以上数端,足以反映出撰写者既严谨务实、继承传统写作体例,又不拘一格、颇富创意的编纂思想。

回想起来,当年黄旭东、汪朴二先生着手从事收集包括萧友梅在内的近现代音乐史料的工作时,还在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数十年矣。为编纂此书,二位先生依托“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不辞劳苦,不避艰辛,四处奔走,多方搜求,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长期沉睡的历史尘封中徜徉,在浩瀚的资料汪洋大海中遨游,终于搜得关于萧友梅先生一批鲜为人知的生平史料,其中有不少档案、文献和图片是迄今为止的首次发现或披露,因而弥足珍贵。我对黄、汪二先生在史料建设中的这种“为伊消得人憔悴”精神深表敬佩,甚至认为即便以“苦心孤诣”或“皓首穷经”二词赞之,亦不为过。而这些史料的发现及出版,不但对于萧友梅先生音乐思想、艺术生涯,教育、教学实践,以及为人品格尤其是民族精神、爱国思想的研究,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更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许多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之进一步研究与廓清,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基础。可以断言,这些珍贵史料的被发现,必将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和思潮史研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还以为,本书之价值及发人深省处,其实已远远超出其图文的有限范围之外。在急功近利成为时尚、浮躁心态无所不在的当代音乐学界,“纪事”及其编纂者给予今人和后人的启迪起码有三点:

其一,它以自身对于实事求是科学精神和锲而不舍治学态度的彰显,为学术界的资料建设和史料建设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范例。相对于黄、汪和戴、张、俞诸位,我等及后辈学人是没有任何理由在这方面偷懒耍滑的,必须走出书斋,到图书馆、档案馆等资料第一线去,力求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把学术研究的资料基础夯实。

其二,它对史学研究中“史实第一性”原则的身体力行的倡导,也将在历史观和方法论层面给史学界同行以极大的启发和激励。无论人们持有何种历史观,都必须要把“史实第一性”置于学术研究的首位;而对那些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学者来说,就更应当遵循、服膺“史实第一性”原则,在铁一般史实面前来不得半点虚假、谎言和遮掩。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忠于历史”、“秉笔直书”,推进音乐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其三,它为音乐学界树立了一个尊重他人学术劳动的榜样。目前学界有些人往往信手引用别人发现的史料而不加任何说明,似有不尊重甚至窃取他人劳动成果之嫌。而本书不仅对所引资料尽皆注明出处,且还对某些史料的首先发现者、某一资料或信息的提供者也一一予以标明。这种尊重他人学术劳动的做法和精神,值得学习、提倡与推广。

基于上述诸点,值此《萧友梅编年纪事稿》正式出版之际,感到由衷高兴和钦佩,并写下这篇文章,以志祝贺,兼为鼓吹。

①《史学方法导论》,见《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湾联德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期《北京大学学报》张岂之《北大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

②《重寻胡适历程》第19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③居其宏《萧友梅“精神国防”说解读》,《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2期。

居其宏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金兆钧)